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百年沪商

朱国栋 刘红◎ 编著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百年沪商

朱国栋 刘红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沪商/朱国栋,刘红编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42-0779-3/F·0779

I. ①百… II. ①朱…②刘… III. ①商业史-上海市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8709 号

BAINIAN HUSHANG

百年沪商

朱国栋 刘红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件: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宝山葑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23.25 印张(插页:1) 417 千字
印数:0 001—1 500 定价:55.00 元

序一

我校朱国栋教授和刘红副教授的《百年沪商》一书，是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

何谓沪商？

我认为，沪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商帮，如晋帮、徽帮、浙帮、闽帮、粤帮等。它也不是沪帮或上海帮，实际上上海从未形成沪帮或上海帮。

上海县原本就是移民县城，上海县的商人来自全国。早在明代就有很多徽商、秦晋商等内地商人旅居上海。清代上海县城云集的各地商人远超明代，其中有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商人，且越来越具重要地位。如广东潮州商人，福建泉、漳商人，江苏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等。随北洋航运而来的有山东的胶西商人、莱帮商人、乳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清代本地籍的上海商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都是全国各地商人。

沪商是上海开埠后形成的。1843年上海在殖民主义炮火下被迫开埠，开埠后各国商人紧随外国殖民主义者而来；稍后出现买办商人；清政府在上海举办洋务企业形成了近代官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涌现出一大批民营工商企业家。

开埠后的上海万商云集，全国各地商帮涌入上海，规模大大超过开埠前。到上海的各地商帮有广东帮、宁波帮、安徽帮、山东帮、天津帮，还有湖北帮、湖南帮、四川帮、山西帮、钱江帮、绍兴帮、南京帮、扬州帮、苏州帮，等等。各地商帮在上海市内商业、钱庄和埠际贸易中各显身手。各地众多商帮汇聚上海，使上海商人比其他城市更具广泛的地域性。而后，跨地域新式商业组织（同业公会）逐渐取代旧式商帮同乡团体，各地商帮逐渐融入近代沪商队伍。各地商帮中的商人不少成为上海新式商业的创办者，成为民营商业企业家。上海一些百年老店，如邵万生南货店、三阳盛南货店、亨达利和亨得利钟表店、蔡同德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都是宁波帮开设。大部分则是一般商人，他们也是近代沪商群体中最庞大的成员。



按其来源划分,沪商由外商、买办商人、官商、民营企业家和一般商人构成。

外商从上海开埠到19世纪60~70年代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对外贸易、江海航运和金融。后来这一垄断被中国商人打破。买办是外商洋行所雇用的中国代理人,为外商做生意,有薪金、佣金、又吃差价,还有利息和各项陋规收入。后来买办们一边为洋行工作,一边也经营自己的生意。买办商人一旦独立经营工商企业,便脱离了买办身份。官商的洋务企业是在与外商抗衡和竞争中创办与发展起来的,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民营企业家起初投资额比例较小,但1913年,民营企业投资额已占国内投资创办企业投资总额的76.3%,超过了官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营企业又获得巨大发展。

上海近代民族工商业与外商不断竞争,到19世纪末才逐渐取得优势。20世纪初,华商在租界内商业中已占全面优势。一位研究上海近代经济发展的美国学者认为:“1905年以后,华商私营企业家在上海工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1920年以后,按西方模式创办的现代华商银行作为上海主要金融机构,可以比得上外国银行。”1926年12月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有一篇文章在评论上海租界时讲到:“即使外国侨民从他们的现代化房屋搬走,回到家乡,它(上海)将依旧是一座大城市。”

沪商既不是传统商帮,也不是传统坐商或行商,而是与资本主义大生产过程相联结的大流通领域商人。沪商按其在流通领域功能分类,有从事国际、国内贸易,市内商业,航运业,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制造商)以及新闻出版、娱乐业等各行各业的商人。

当然,沪商也是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的现代商人,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法律意识。沪商还具有浓厚的海派风格,集中表现为“海纳百川,融汇中西”的气度,平等竞争意识和依法经商。这就是沪商之精明所在。

为什么要研究沪商?

20世纪20、30年代,在沪商推动下,上海成为中国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制造业中心和中国文化中心,成为国际著名的近代化大都市。

沪商形成与发展仅有百年。外商从1843年上海开埠进入上海到1949年撤离上海,历经一百多年。1927年后,洋务企业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收归国营,仍为官商。上海解放后,官商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从1865年成立第一家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算起,近代官商寿命不足百年。私营工商企业

存在也约七八十年,买办商人创办的工商企业、民营工商企业和一般商人,于1952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保留的个体工商户数量很少。官商作为官僚资本被剥夺,其他商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计划经济,沪商发展因此中断。改革开放后,沪商重又发展起来,可称为“新沪商”。境外商人,包括日韩商人、欧美商人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商人纷至沓来;港台商人纷纷抢滩上海;内地各省市商人,如浙商、苏商、徽商、闽商、粤商、晋商、鲁商、川商乃至维吾尔族、藏族商人都登上上海。上海在国家主权独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高度上,再次成为国际国内商人的大舞台。

研究沪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近代沪商,尤其是民营企业企业家们,不仅留下可观的物质财富,还留下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新沪商可从百年沪商历史中吸取丰富教益,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也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首先,近代沪商们敢于挑战风险,勇于创业。民营企业创办人,很多是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并无雄厚资本。商业企业创办人如“五金大王”叶澄衷,中法大药房和“新世界”、“新新舞台”、“大世界”等游乐场的创办人黄楚九,“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绿宝金笔厂的创办人汤蒂因,“食品大王”冼冠生等是这样。工业制造业创办人也是如此,如荣氏企业创办人荣德生和荣敬宗兄弟,华生电机厂创办人杨济川等。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鲍咸昌、夏粹芳也是学徒出身。著名实业家胡厥文,“味精大王”吴蕴初,新中机器厂创办人支秉渊,五和织造厂创办人任志刚等虽非学徒出身,创办企业时也无资本。

官商洋务企业创办也面临风险,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清政府财力支绌,江南制造局难以逃脱“裁停”命运。后来李鸿章把洋务企业引上创办民用企业之路,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形式,才办成一系列洋务企业。

甚至外商也不是个个都挟巨资来沪,许多也是白手起家。英商会德丰洋行大班麦克林为在上海开设汇丰银行,要回英国筹资,却缺少回国费用,向钱庄职员王槐山借了一笔钱才得以成行。哈同洋行创办人哈同,少年时捡过破烂,22岁到上海进老沙逊洋行当门房,后来成为上海房地产大王。买办商人投资新式航运和其他工商企业也都敢于冒风险,刘鸿生为避投资风险,多行业进发,最后成为煤炭、火柴、毛纺织“三大王”。很多买办商人都是幼年做学徒,后来当上买办,例如朱葆三、虞洽卿等。创业之路无不充满艰辛和风险。

第二,他们追求卓越,开拓创新。近代企业普遍采用西方引进的股份制。

有些企业开创之初就是股份制，“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且在管理上引进美国最新科学管理方法。曾在上海创办德大等纱厂的穆藕初，曾赴美留学，直接向泰罗博士学习科学管理方法。是他最早把泰罗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在其厂内推行，效果很好。其他企业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许多企业由此走上管理制度化之路。在生产设备上，“机器力求其新”。1921~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说：“中国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采用国外机器设备”。

官商洋务企业也普遍采用“西法经营”。轮船招商局股票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官商江南制造局在聂缉规任总办期间也精简机构、废除工头制，实现了扭亏为盈（聂后来任上海道台）。其他洋务企业也类似。所有官商洋务企业，都派专人赴国外采购最新机器设备。

成功的近代企业，都把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第一生命，具有强烈的商标意识、品牌意识，重视广告效应。先看厂名，荣氏企业的“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本身就是企业宗旨；胡厥文办的机器厂叫“新民”，穆藕初办的纱厂叫“德大”、“厚生”，大中华橡胶厂的“大中华”，反映了创办人的抱负。再看产品商标：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人钟”牌棉纱，德大“宝塔”牌棉纱，大中华“双钱”牌轮胎，刘鸿生“象”牌水泥和“美丽”牌火柴及章华毛纺厂的“九一八”牌叽细呢，五和织造厂的“鹅”牌内衣。还有“固本”牌肥皂，“箭刀”牌肥皂，“三星”牌蚊香、牙膏，“414”牌毛巾，“三五”牌台钟，“华生”牌电扇，“佛手”牌味精，“龙虎”牌仁丹，“红双喜”牌香烟，等等，不胜枚举。每一品牌都是企业生命力的表现，饱含无数辛劳和智慧。凭着这些产品，沪商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得到发展，不少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

外商自然精于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之道。1862年旗昌轮船公司创办时，用股份制组织形式创办资本100万两，其中华商资本有60~70万两。外商产品一度铺天盖地，充斥中国市场，如“邓禄普”牌轮胎，“奇异”牌电扇，“味の素”牌味精，“野猪”牌蚊香，老刀、哈德门香烟等。美孚洋行为推销其煤油，免费赠送中国用户“美孚灯”几百万只。外商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当时中国沿铁路、公路、河道两旁农舍的白粉墙上，常常同时可看到美孚、壳牌和德士古三家公司的广告。

第三，民营企业家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蚕食，遭受欺凌，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等理念成为民营企业家核心价值观，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胡厥文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就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并选择了机械系学习，1918年毕业后，到处借贷创办了新民机器厂，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方液仙于1933年

联合华生电机厂、美亚织绸厂等企业在南京路慈淑大楼设立中国国货公司，专售国货，因不与日伪合作，1940年7月被汪伪劫持至“76号”特务机构，因重伤殒命。1937年，新民机器厂等149家企业入川。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刘鸿生、周作民等在各自领域称“大王”的企业家和银行家选择了留在大陆，或由香港返回，其中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沪商的共性。

民营企业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为不以营利为唯一目标，重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在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同时，还支持教育文化事业，参与社会变革。

“五金大王”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是沪上创办最早、最负盛名的民办学校（今为上海市澄申中学），胡适曾在该校读书。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桥梁、公路等。张謇在上海投资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1953年合并组成大连海运学院）、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由南通师范开始举办了一系列学校，从幼稚园、南通中小学、师范、专科直至大学，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民营企业家支持教育文化事业的情况极其普遍，在国弱民穷的旧中国，他们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当时，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沪商们还直接参与了社会变革。李平书在上海华界、张謇在南通领导地方自治。张謇还是全国立宪运动的实际领袖。李平书、沈缙云（中国首家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直接参与领导辛亥上海光复起义，攻打江南制造局。在他们身后跟随着众多的沪商。买办商人也有爱国热情，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支持辛亥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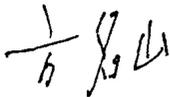
官商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是爱国的。买办出身的盛观应，先后任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的总办，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一系列“救国强国”主张，该书对康有为、孙中山都有影响，青年毛泽东也读过。也是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在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时，力求“为国争利”。

沪商群体中的外商们各有自己的祖国，他们抱着“改造东方”梦想和野心来到上海。但他们中多数人的行为遵循的是市场法则。到20世纪30年代，有些外商已把上海看作他们永久的家。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的前一个晚上，曾有一位英国商人说：“现在已经到了时候，我们可以摒弃那种所谓外国人只是来上海待个几年，赚了钱就要离开的想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永久的家。”外商是沪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上海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

贡献不能忽视的。确实也有不少外商已把上海看成第二故乡。

《百年沪商》一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开埠”，介绍沪商形成的客观条件和活动舞台。第二章“洋行”、第三章“买办”、第四章“洋务”分别介绍外商、买办商人、洋务企业官商的背景和形成。第五章“金融”、第六章“商业”、第七章“航运业”、第八章“制造业”按产业划分，反映沪商在各经济部门的活动，着重介绍民营企业活动。第九章“新闻出版业”、第十章“娱乐业”反映沪商在文化领域的活动，是上海成为近代文化中心的组成部分。第十一章“商人与政府”反映沪商在旧中国的爱国政治行动及其发展轨迹。本书通过介绍各门类沪商活动，立体、全景式地反映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政治。书中除着重介绍商人外，还介绍一些经济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业记者、作家，娱乐业戏剧家、演员，非如此不能反映全貌。全书以大量个案，有侧重的具体表现各类沪商的创业过程、经营理念和特点。本书作为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辅助成果之一，还力求言简意赅，并配以图片，尽力做到生动形象，可读性强。近代沪商研究在我校还刚起步，有赖于学术界共同探讨，恳请读者指正。

上海商学院校长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

 研究员

2010年1月28日

序二

上海是中国典型的由商而兴、因商立市的城市。

上海在古代就是港口城市。“上海”这个名词，最初来自一条叫“上海浦”的浦名，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以前设“上海务”，南宋设上海镇(今十六铺附近)，元代设上海县，都同上海港商贸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江海中转枢纽港，货物吞吐量居全国首位。城市依港而兴，上海赫然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上海又是中国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国际大都市。

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接着，外国殖民主义者辟建租界，在其取得的“永久租赁”的“居留地”上攫取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还建立了一支军队——万国商团，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但在动乱不安的旧中国，租界却保持了安定。

从开埠到1936年，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五大中心”：

上海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在1894年、1933年和1936年，分别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53.77%和55.56%。对外贸易形成了以洋行为核心，集航运、港口、贸易于一体，从国外到国内经济腹地都有自成体系的资源组织和中转、联运、销售的网络。上海也是国内埠际贸易中心。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90 000亿元，占全国的75.2%。国内贸易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以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包括一批开放口岸，由东向西推进的沿江商业贸易走廊。

上海是远东航运中心，即国际航运中心之一。1931年上海港跃居世界港口第七位，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 400万吨。仅以本国轮船企业为例，1936年全国500吨以上的轮船企业共99家，船404艘，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有58家，船252艘。以上海港为起迄港或中转港的国内外航线总计在100条以上。

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即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自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开设以后，到20世纪初，各国在上海开设的银行计有68家。自1897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

设以后,华资银行纷纷在上海设立。1925年在上海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钱庄的资金比重分别为40.8%、36.7%及22.5%。1928年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及受其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总部也设在上海。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的35%。

上海也是中国工业制造业中心。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各国外商在上海大规模办厂,民族工业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获得巨大发展,上海成为中国工业的重镇。1927年以前中国民族工业企业超过1/5落户上海,上海集中了全国1/4以上的民族工业资本;1932~1933年,全国共有2435家现代工厂,其中一半在上海;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0%。

上海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办学校、办新闻出版机构,教授西学、翻译出版西书、发行报刊。西学传播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创办自己的新式学校、新闻出版社。上海的教育事业领先全国;上海的新闻业影响全国的舆论;上海的出版业是中国新文化的支柱。上海曾汇聚了全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各大出版社各具特色,戏剧、电影、歌舞等各种娱乐业也十分繁荣,对全国有广泛影响。

上海租界原是县城外的“荒野之地”,“一片泥滩,三数茅屋”。开辟租界后,租界当局在租界内的市政、公用事业设施相继展开。20世纪初,西式马路已纵横交错,有轨电车在大马路(南京路)行驶。令当时中国人感到惊奇的电灯、自来水、电话等,在租界逐渐普及,市政管理也井然有序。中国人从惊讶到效仿,华界也向租界学习,开始拓宽平整马路、疏通淤塞发臭的河道、安装路灯,辛亥革命后拆除城墙,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相继自办。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到20世纪30年代已形成巍峨参差、鳞次栉比、具有世界各国风格的建筑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在上海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沪商(上海商人)的作用毋庸置疑。上海成为“五大中心”的国际都市,清政府无从预料,租界当局也并无蓝图,任何人(法人或自然人)都无力作如此规模的投资,无人能做计划,也无人能指挥。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是在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进行的。各类沪商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拼搏。

近代沪商群体,按其来源大致有七种类型:

一是外商(亦称洋商),他们是紧随殖民主义者之后来到上海的。他们人数不多: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总人数1844年为50人,1851年为265人。除太平洋战争那几年之外,上海的外国侨民人数从未超过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

但他们个个野心勃勃,再加依仗本国的强权,能量很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力推行到上海。他们设洋行、搞航运、开银行、办工厂,为上海成为贸易、航运、金融、制造业中心奠定了基础。

二是买办商人,即买办出身的商人。“买办”是外商企业所雇用的中国代理人,是沟通中西贸易的桥梁,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19世纪50年代以后,买办们开始一边为外商工作,一边经营自己的生意,具有双重身份。上海的买办商人数量颇多,有人统计,1925~1926年间,上海总商会45%的董事和22%的会员拥有双重身份,既当买办,又当老板,并在日后脱离买办身份,投资办工商企业。上海不少大型航运、工业企业的创办人,都曾经是买办,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虞洽卿、朱志尧、刘鸿生等。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公司——上海新民公司的创办人张石川,也是买办出身。

三是官商,即洋务企业的总办、会办等。官商在中国古代就有,但洋务企业与其有区别。洋务企业是在与外商抗衡的环境中创办的,吸取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向近代化迈出了一步。洋务运动的实绩在上海最显著,其中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等都设在上海。这些企业是当时中国人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代表人物是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洋务企业中一些总办、会办也曾是买办,如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他们既有大量资金投入洋务企业,又具备经营管理的“洋务”知识。

四是绅商,即出身绅士的商人。绅士是拥有科举功名(也可由捐纳而获得),与官吏关系紧密,享有政府赐予的特权,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是在地方上享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上海开埠后,上海县城绅士和外地绅士移居上海,下海经商者人数不少。著名人物有严信厚、严子钧父子,张謇,张元济,李平书,经元善等。严信厚曾任上海工商会议公所(第一届总商会)总经理(即会长),张謇也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清末民初,他们在上海商界和上海以至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不复存在。

五是商人,这是沪商群体中最庞大的队伍。他们从学徒逐渐成长为一般商人,而后成为工商企业的创始人者,也大有人在。由纯粹的商人身份成为工商企业家的,有“棉纺织、面粉大王”荣氏兄弟,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鲍咸昌、夏粹芳等。

六是华侨商人。近代华侨对上海的投资占全部华侨回国投资总额的七分之一。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大中华橡胶公司的创办人余芝卿等,都是华侨商人。

七是知识型商人，他们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或自学成才。穆藕初、陈光甫、周作民、被称为“绸业大王”的蔡声白，均是留学美、日的“海归”；上海县城自办自来水厂、电灯厂和电车厂的陆伯鸿是留法学生；著名实业家胡厥文、“味精大王”吴蕴初等均有高等教育背景或自学起家。他们创业时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

以上七种商人构成了沪商群体，他们在近代上海内外贸易、航运、金融、商业、制造业、新闻出版、娱乐业等各行各业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

上海商学院朱国栋教授和刘红副教授的《百年沪商》一书所研究的内容，属于上海近代经济史范畴。本书比较完整地、历史地再现了沪商在近代上海经济领域的活动。但本书没有局限于经济史，还涉及了沪商在新闻出版、娱乐业等文化领域的活动和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本书虽是经济史，但未采用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是运用散文形式，形象地再现历史，颇具可读性。

今天的上海是近代上海发展的结果，吸取近代沪商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上海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犹待学术界对近代沪商有更深入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研究员

张仲礼

2010年1月20日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开埠	1
第一节 在屈辱中开埠	1
一、悲壮的吴淞保卫战	1
二、参加鸦片战争的传教士郭士立	2
三、巴富尔宣布上海开埠	3
第二节 租界的形成与扩充	5
一、租界起源	5
二、美、法租界的形成和英租界的扩充	6
三、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	7
四、英美租界的合并与公共租界的形成	8
五、法租界的两次扩充	10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丧失	11
一、列强攫取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发端	11
二、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13
三、公共租界工部局	14
四、租界巡捕房	15
五、华人巡捕黄金荣	17
六、法公董局设立中法学堂	18
七、租界会审公廨	20
八、万国商团	21
第四节 租界被收回	23
一、收回租界	23

二、跑马厅土地的收回·····	24
第二章 洋行 ·····	26
第一节 1853 年之前开设的洋行 ·····	26
一、鸦片贸易起家的怡和洋行·····	26
二、宝顺洋行的兴衰·····	28
三、独霸长江航运的旗昌洋行·····	29
四、《字林西报》与字林洋行·····	30
五、1853 年外滩风景线·····	31
第二节 19 世纪下半叶开设的洋行 ·····	32
一、稳健发展的太古洋行·····	32
二、“跷脚沙逊”与新沙逊洋行·····	34
三、以贩卖军火著称的礼和洋行·····	35
四、“美孚灯”与美孚洋行·····	36
五、广开财源的鲁麟洋行·····	38
六、投资上海纺织业的三井洋行·····	38
第三节 20 世纪开设的洋行 ·····	40
一、卜内门洋行的商战·····	40
二、“地皮大王”哈同与哈同洋行·····	41
三、“张葺彭”拒迁祖坟·····	43
四、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经历·····	44
五、雷士德与德和洋行·····	45
第三章 买办 ·····	48
第一节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买办 ·····	48
一、沪上“康摆渡”·····	48
二、从买办到独立商人的徐润·····	49
三、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50
四、为国争利的买办唐廷枢·····	52
第二节 汇丰银行买办 ·····	53
一、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王槐山·····	53
二、汇丰银行的买办世家·····	54
第三节 其他洋行买办 ·····	56

一、“阿德哥”与“会审公廨”案·····	56
二、朱葆三大出殡·····	57
第四节 另类买办——杨坊与华尔洋枪队·····	58
第四章 洋务 ·····	61
第一节 李鸿章与盛宣怀·····	61
一、李鸿章到上海·····	61
二、洋务总管盛宣怀·····	62
第二节 洋务企业·····	64
一、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工厂·····	64
二、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的竞争·····	66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风雨历程·····	67
四、中国的第一家银行·····	70
五、近代中国最早的假币案·····	71
第三节 新式学校·····	72
一、广方言馆·····	72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74
三、徐寿父子——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先驱·····	75
四、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	77
五、南洋公学·····	79
六、墨水瓶事件和爱国学社·····	80
第四节 洋务官员策划东南互保·····	82
第五节 洋务官员的临终嘱咐·····	83
第五章 金融 ·····	85
第一节 上海钱庄·····	85
一、清末民初的货币·····	85
二、上海钱庄与银行·····	87
三、秦润卿——上海钱业第一人·····	90
第二节 外资银行·····	92
一、英国银行独霸时期·····	92
二、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94
三、外国银行六强并存与竞争·····	95

四、“金融帝国”——花旗银行·····	97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消长·····	99
六、三井财团的核心——三井银行·····	100
第三节 中资银行·····	101
一、张家璈与中国银行·····	101
二、中国的优秀金融家陈光甫·····	103
三、金融界的不倒翁——周作民·····	104
四、金融界四巨头之一——钱新之·····	106
五、李铭与浙江实业银行·····	108
六、浙江兴业银行的兴衰·····	110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改革家——宋子文·····	113
八、中汇银行董事长杜月笙·····	116
第四节 金融危机·····	118
一、1883年的金融危机·····	118
二、红顶商人胡雪岩破产始末·····	119
三、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	121
四、1921年的上海信交风潮·····	122
五、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23
六、1947年的黄金风潮·····	124
七、蒋经国上海“打虎”纪要·····	126
第六章 商业·····	128
第一节 内外贸易·····	128
一、“五金大王”叶澄衷·····	128
二、澄衷学堂·····	129
三、外贸耆宿叶鸿英·····	131
第二节 商海沉浮·····	132
一、我国近代著名的营造专家——杨斯盛·····	132
二、商业巨子黄楚九·····	135
三、中国新药业先驱——项松茂·····	136
四、华界市政建设功臣——陆伯鸿·····	138
五、国货旗手方液仙·····	139
六、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141